

DAOJIA
SIXIANG DE
LISHI ZHUANZH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何建明 著

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无
名，天地之始；有名，
万物之母。常无欲，以
观其妙；常有欲，以观
其微。此两者，同出
而异名，同谓之玄。玄

之又玄

大炒之丁



道家思想

的历史转折



DAOJIA
SIXIANG DE
LISHI ZHUANZH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何建明 著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无
名，天地之始；有名，
万物之母。常无欲，以
观其妙；常有欲，以观
其微。此两者，同出
而异名，同谓之玄。玄
之又玄，众妙之门。



国防大学 2 065 6960 3

DAOJIA SIXIANG DE LISHI ZHUANZHE

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

何建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何建明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2
(桂苑书丛)

ISBN 7-5622-1718-1/B·48

I. 道… II. 何… III. 道家-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唐代
IV. B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447 号

DAOJIA SIXIANG DE LISHI ZHUANZHE

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

◎何建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正佳彩色制作输出中心照排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程继松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江满情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410 千字

版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700

定价:19.00(简装)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

古典后期中国与近代早期中国之间的过渡，主要发生在公元 8 世纪前后。李唐王朝从此走向衰落，征服的钟摆开始长期转向中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还发生过其它方面的一些更加微妙的变化，它们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赖肖尔 (Edwin O. Reischauer)《中国：传统与变革》第六章。

出版前言

“桂苑书丛”是我社建社早期组织的一套丛书，80年代曾推出五种，均系青年学者的论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我们在出版以前辈学者产生过影响的论著为内容的“桂岳书系”的同时，继续长期出版“桂苑书丛”，主要是及时发表华中师范大学青年学术带头人的最新重要研究成果。

我们的校园既有参天大树，也有如茵的绿坪，共同构成宏阔幽深而富有盎然生气的美丽景致。今日的大树，是由昨日的幼苗长成；今日的幼苗，可望成为明日的大树。一代一代，使我们的学术事业，永葆青春活力。

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本是先师们的期望，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桂苑书丛”的作者却还有他们特别的幸运。他们是70年代末期以来先后接受学术训练，次第攻读学士、硕士、博



士学位，踏上学术道路的。他们在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的环境中，得以专心致志精研本民族的典籍，得以便利地探求域外的新知；他们在撰写和发表论著的客观条件方面，也享有前人当年缺少的惠益。这一代学者群的成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主义祖国前进的雄姿；他们的论著，也自然具有前人所少有的新颖的特色。每当我们编阅这类书稿的时候，不但真切地看到作者无畏拼搏的身影，而且还总是真切地嗅出作者的导师们思想乳汁的芳香，又总是欣悦地听见时代涛声的回响。我们往往产生这样一种感受：自己不是面对一本书稿，而是面对一位正在或即将崭露头角的学人；不是面对一位学术界新人，而是面对一个大步迈进的学科；不是面对一个学科，而是面对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学术事业。

由于我社为校内若干学科、若干系所编有多套丛书，每套丛书的作者包括一个学科或一个系所老中青几辈学者。因此，“桂苑书丛”所收录的，远不是我校青年学者新作的全部，而只能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策划这套书是想表达出版工作者对新生学术力量的关注之情。本世纪初，长沙杨昌济先生寓意深远地题句云：“欲栽大木柱长天。”杨先生所从事的是少数先觉者的开辟工作，我们所参与的则是全民族浩大严密的系统工程。值此春和景明之时，在美丽的校园里，在祖国的大地上，千千万万幼树正伸枝展叶、茁壮成长，让我们都来浇灌和培植吧！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4月20日

萧道父

道

家和道教的思想学脉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洪波浩瀚中，据有重要地位，发挥过独特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视野扩大，道家和道教思想文化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关于这方面的论著，也逐年增多。长期以来因传统偏见所形成的“儒热道冷”局面，正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变化。应该说，这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学术正逐步摆脱“贵一而贱多”的传统格局而走向多元化的合理发展趋势。

道家与道教，原本殊途，后乃同归。在唐代，老子被神化为李氏先祖，道家的地位因此得到显著的提升。李氏王朝多次尊封老子和庄子等道家人物，并将《老》、《庄》、《列》、



《文》等道家著作升格为“经”，颁令天下士子研习。原来就很注重吸取道家思想的道教，为加强理论化建设而进一步依托于《老子》和道家的哲学思辨，乃至内化为道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重要的道教人物，都以不同的形式注老解庄来发展道教理论。在“三教”融合总趋势的影响之下，一方面有成玄英等学术精英，吸纳儒、佛，阐扬道论；另一方面又有唐玄宗等帝王将相，崇道佞道，推波助澜，遂使唐代的道家思想文化在各方面得到丰富发展，进入空前繁荣的境地，因此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论著在量上的增加，而且更需要在质上的提高。近些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道家和道教思想文化的学术研究，不仅需要着眼于宏观的通史、通论，而且更要注意从微观着手，开展断代的、专题性的研讨。只有通过对某些重要时期的重要专题的深入研讨，才能真正促进通史、通论性宏观研究水平的提高。这就很需要有脚踏实地、知难而进的精神。掘井必须及泉，吹沙才能见金。已故前辈学者陈寅恪、陈垣、蒙文通等，都很注重专题性研究。陈垣先生甚至多次劝导青年学者应当注意“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以免“空泛而弘廓”^①。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何君建明，英年好学，在风雨声中勤读于珞珈与桂子山间，博涉敏求，孜孜不倦。近些年，他有志于道家和佛教思想文化的研究。这部《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是他以断代、专题为基点，几年来潜心研究道家思想文化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一部深入剖析道家思想历史性变化的论著。他针对长

^①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期以来因各种原因造成对唐代道家思想文化缺乏深入、系统研究的状况，以此作为其研究道家思想的突破口，没有采取沿袭成说、排比史料，铺叙出一部“唐代道家思想史”的捷径，而是决心下笨工夫，采山之铜，力求系统、直接地占有《道藏》等有关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慎选某些代表人物和重要思潮作为个案，进行了较为周密的专题研究；同时，认真吸取了海内外诸家的研究成果，敬重前修，择善而从，扬榷诸家，敢标新意，从而使本书对唐代道家和道教的理论发展的研究，有所突破，具有补白、拓新的意义。

作者自觉地把唐代道家思想放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唐中叶的历史性转型和道家思想历时性发展的总态势之中来加以考察，力求宏观立论、微观考史，史论结合，独有会心地引申王明先生“老学三变”之说，指出道家思想的逻辑结构，主要包含着哲学思辨、政治关怀、修炼养生之道这三个主要层面，中国道家思想的历史发展，也主要是这三个层面的历时性展开与深化。通过对唐代道家和道教思想的深入研究，揭示出道家思想在唐代（尤其是中后期）自觉适应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中也实现着从重玄思辨走向现实关怀、从炼气存神及外丹学走向性命双修的内丹学、从“道本儒末”走向“儒最尊”的历史性转变，分析了唐代道家和道教在哲学思辨、心性修养、养生学和社会政治关怀等方面独特的贡献及其在中国后期宗法社会思想文化传统形成中的特殊地位。

对于学林前辈的学术观点，作者认真消化，但不苟从，在占有原始资料、进行合理分梳的基础之上，对某些流行的学术观点提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补充、修正和驳谬。比如，关于“重玄”思潮，国内外学者多有涉及，但众说纷纭，难求共识。作者通过较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力排众议，指出中国



历史上以“重玄”思辨发挥老庄哲学的学术思潮，可以界定为“道家重玄学”；它的真正宗源，可以追溯到庄子；他的理论内涵可以概括为道体重玄论、道性自然论、修心复性论和重玄境界论及重玄思辨方法论的统一。这样的理论分歧，揭示了隋唐哲学思辨和道家心性之学的丰富内容。又如澳籍华人学者柳存仁先生曾对唐玄宗自行改易《道德经》文字的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发表了多种重要论著。但是，本书作者认为，柳先生虽考辨深细，仍难免有所疏漏，如没有注意到唐玄宗将“清静为天下正”改易为“清净为天下正”的重要性。本书强调，唐玄宗这种改易，并不是以“清净”否定“清静”，而是通过佛道融合，使“道”同时具有“清静”和“清净”的双重特性，从而丰富了道家的道性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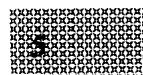
本书还有一个致思的特点，就是力图将历史与现实、鉴古与筹今结合起来，深入开掘道家思想的优良传统和现代意义。如有的论者曾论断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迂腐不堪，实不足观”。本书作者通过古今贯通地深入考察，指出王真所提出的“用其所不用”、“权与道合”等“理兵”观念，深入到对人性的研究与调适之中，并非简单的否定兵战，而是强调兵战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解决天下、国家的争端，不能一味地诉诸武力，而应当尽可能地采取和平的政治方式。这些观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近些年来各种迷信方术以种种方式死灰复燃，作者在充分肯定唐代道家和道教关于修炼养生等道术中的合理思想的同时，着力弘扬了作为道家和道教精神传统的真正维护者成玄英、张志和、司马承祯、吴筠和罗隐等人对于各种迷信方术的揭露和批判精神，指出“神仙”只是人们追求自由的一种美好的理想境界。作者还对唐代道家关切现实人生，批评积弊和时病，追求精神自由，祈望政通人和、五谷丰登、延年益寿

和文化心态上的兼容并包、虚怀若谷等方面宝贵精神资源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积极的发掘和合理的肯定。

当然，正如作者在“后记”中的自白，由于汲绠尚浅，涵泳不深，本书不免存在未洽人意之处，有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周密论证。黄宗羲有云：“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①我希望作者继续努力，不畏艰难，勇攀高峰，进一步取得新的成果。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元月匆草于北海

① 《清溪钱先生墓志铭》，《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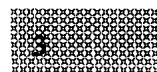
序	萧莲父
绪论	(1)

上编 重玄思辨走向现实关怀

上编引言	(21)
第一章 道家重玄学的理论旨趣	(26)
一、“道家重玄学”刍议	(26)
二、《道体论》的哲学思辨	(43)
第二章 道家重玄学的政教合一	(71)
一、摄佛融儒的政教合一之道	(71)
二、“道生德畜”，“物感必应”	(81)
三、“道性清净，修性反德”	(98)
四、“体了真性，心与道冥”	(108)

五、“真经要在乎理身理国”	(118)
第三章 重玄思辨的现实政治关怀	(140)
一、重显“重玄”，援史论“道”	(140)
二、“道体幽玄，生三吹万”	(148)
三、“法道忘功”，“用道匡时”	(157)
四、“多闻博学，不如体真”	(173)
五、“自然无心”，“无为无滞”	(185)
中编 外丹炼气术走向内丹学	
中编引言	(199)
第四章 从“服气延年”到“坐忘得道”	(204)
一、从“传上清正一之法”到学“天台”	
阐“坐忘”之论	(205)
二、“食气者神而寿”——对传统炼气养生	
思想的总结	(212)
三、“道性本虚无，六根随性行”	(224)
四、“炼气成神”，“坐忘得道”	(238)
第五章 “仙道可尚”，“积学修真”	(268)
一、“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	(268)
二、“与天地为元，与万物为本”	(273)
三、“神仙体虚，可学而致”	(281)
四、“积学修真，得道成仙”	(297)
第六章 “性命双修玄又玄”	(314)
一、“仙有五等，道不远人”	(315)
二、“法有真假，从师授法”	(322)
三、“法有三成（乘），修持在人”	(328)
下编 道本儒末走向儒最尊	
下编引言	(341)
第七章 道家为本，儒家为末	(347)

一、“道德为礼之本，礼智为道之末”	(347)
二、“六经乃黄老之枝叶”	(355)
三、“清心养气”，“忘形全神”	(359)
四、“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363)
第八章 道德仁义礼“五材相资”	(372)
一、力阐论兵之旨	(372)
二、“因道制名”，“偃武修文”	(375)
三、“耀德于外，体道于中”	(384)
四、“用其所不用”，“权与道合”	(391)
第九章 “孔老之术不相悖”	(399)
一、“老孔旨一”，“体用玄合”	(399)
二、“秉要执本，在乎情性之极”	(411)
三、“原天地之始，陈古今之变”	(415)
第十章 “老内孔外”“儒最尊”	(437)
一、“三教之中儒最尊”	(438)
二、“神仙不可以伎致”	(447)
三、行儒家之权，达道家之实	(455)
结语	(469)
主要参考文献	(473)
后记	(480)
审读报告	章开沅 (484)



緒論

与我们今天（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在晚唐和宋代（960—1279）成型的。“六朝与初唐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最后阶段。晚唐与宋则组成了中国后期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可将这一时期称作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化直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始终保持着中国自身的特色。”^①而且，“晚唐和宋代形成的文学、艺术，及社会、政权模式，（当然还包括思想特征——引者），直到20世纪初

^① 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译本，第116~1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期在中国文明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①。然而，从初唐到晚唐，中国的社会与思想文化是如何地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最后阶段”过渡到中国历史的“近代早期阶段”呢？这是近百年来中外许多历史学家们所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就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而言，由于李唐王朝认定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李耳）为先祖，特别强调道家（教）的显要地位，因而，道家思想实际上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转变的重要标志。

国际著名科学史家、道家学研究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曾经指出：“在唐代，真正的道家哲学出现了第二次的繁荣。在公元6世纪和10世纪之间，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书籍，这些书籍以道家的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识作为背景，复活了并扩大了许多旧教义。这些书籍应该好好读一读，值得人们更深入地研究。”^②可是，长期以来，国内外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者们，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即使是一些专门研究唐代哲学与思想文化的著作，对道家思想的研究较之对佛学和儒学的研究要薄弱得多。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第一，唐代道家多以宗教身份出现，然而，就其宗教哲学的理论性而言，又似乎不及当时正如日中天的佛教学，因而，研究者们通常对唐代道家作宗教史的研究，对于佛教则通常作宗教哲学的研究，可以说，这是佛教学掩盖了道家学。第二，儒家思想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对唐代哲学与思想的研究，也就偏向于对当时的儒家学说的探讨，更何况，韩

① 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译本，第119页。

②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译本，第474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